

## 民进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分析

林 劲\*

所谓政党的组织结构,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指的是为政党的正式文件所明确规定并设置的组织机构,而后者指的是虽然政党的正式文件没有明文规定甚至明文禁止,但却是实际存在且明显影响政党运作的结构,这种非正式的组织结构有时候并不一定有清晰可辨的外观,如民进党内各个时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派系。就民进党而言,由于其在创立之初就以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为模仿对象,因此二者在正式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譬如,两党都属于刚性政党,都有明确的政治理念,都有一定的入党标准和程序,都有较为严格的党纪,并且都有层级分明的各级党部以及分工明确的各类专业工作部门。当然,若以党内民主程度来衡量,民进党在党内民主方面的表现一直优于具有威权传统的国民党。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产生、公职选举候选人提名制度采用党员投票和民意调查等制度设计,在台湾各政党中,民进党都是最早实行的。近年来,国民党经过几番组织改造,已经反过来借鉴和学习民进党某些党内民主的制度(譬如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产生),从而使得两党在正式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减少。不过,要是从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的角度的角度来看的话,则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党内长期存在制度化运作的派系政治,这一非正式的权力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外界观察民进党政治运作经常聚焦的着眼点。因此,民进党派系政治生态这一独特性,便构成该党组织结构最突出的基本特征。

### 一、民进党内派系政治生态变化的基本脉络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政党起源于数个政党或势力的结合,将有利于其党内派系的形成。民进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独特派系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其成长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民进党成立之前,党外势力主要有两大团体,即以党外公职人员为主体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以及以党外年轻的编辑、作家、助理等为主体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这两大团体在从政经历、政治理念、政治利益以及政治操作风格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在反对国民党的共同目标下,两者联合起来并且共同创建了民进党。民进党成立之后所出现的各个派系,大部分就是从以上两大团体分化组合而来。建党初期,民进党内主要有康系、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前进系等几大派系,其中康系人数最多;但新潮流系却有较强的战斗力;美丽岛系由于主要头面人物都在服刑中,只是一个松散的派系;另一个派系前进系由于先天不足,并无多大影响力。因此当时党内主要是康系与新潮流系的抗衡。1987年,黄信介、张俊宏等美丽岛系大老出狱后,美丽岛系经过重新整合,成为民进党内最大的派系,而康系因为领导人康宁祥在民进党内地位的下降而式微。前进系则随着主张两岸统一的领导人林正杰退党而消失,其成员大多为美丽岛系所吸纳。之后,民进党内众多派系的纷争中逐渐形成泛美丽岛系和泛新潮流系这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对垒使民进党内的权力之争、路线之争达到尖锐化的地步,甚至一度濒临分裂的边缘。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构有所松弛,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所缓和,形成了“派系共治”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在1990年代初通过了“台独”党纲,使之前党内关于“台独”的路线之争缓和下来;二是在美丽岛系的许信良出任党主席后,邀请新潮流系龙头人物邱义仁出任副秘书长,形成两大派系共治民进党的局面;三是原先分别亲近两大阵营的陈水扁和谢长

\*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廷各自发起成立了“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等派系,加上从海外迁回台湾活动的“台独联盟”也进入民进党旗下运作并成为一个新的派系,使得民进党内派系生态由原先的两极对立结构变成多元竞争结构,从而增加了派系之间缓冲和妥协的空间。总的来说,在整个1990年代中后期,民进党基本上是由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以及“台独联盟”等五大派系所“共治”。不过期间美丽岛系因为黄信介的去世和许信良、张俊宏两位大老的争权内斗以及许信良的退党而元气大伤,最终分裂成“新动力办公室”和“新世纪办公室”两个小派系。而“台独联盟”也有部分成员因为不满民进党的政党转型而选择脱党。

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之后凭借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而成为民进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民进党原来“派系共治”的格局随之逐渐转变为陈水扁“一人独治”的局面,原本操纵民进党的派系退居权力边缘,出现派系淡化的迹象。同时派系发生了重新分化组合,建党初期的两大派系之一美丽岛系趋于消亡,大部分成员投靠了正义连线;另一派系新潮流系则继续稳定发展,许多成员占据要津,是最有战斗力的派系,但其实力的强大引发其他派系的危机感,为此组成反新潮流的战略同盟——即所谓的“主流联盟”,不过“主流联盟”因为内部矛盾重重而没有发挥作用;被称为御林军的陈水扁嫡系派系——正义连线则急剧扩张,一度成为拥有“立委”人数最多的派系。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里,主导民进党的派系就是陈水扁的正义连线、新潮流系、谢长廷的福利国连线,其龙头人物把持台湾当局及民进党的重要职务,拥有绝大多数党籍的公职人员,中执委、中常委的席次基本上呈“三强鼎立”的局面,苏贞昌的势力基本上与新潮流合作。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正义连线和新潮流系实力上升迅速:正义连线作为陈水扁在党内的嫡系队伍,自然“水涨船高”及应验“西瓜偎大边”效应,得以迅速发展,自不待言。新潮流系依靠自身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团结协作、扎实经营而逐步发展,实力大增。该派系注重内部民主协商,注重培养梯次人才,若干重要人物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曾经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党中央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及部会首长、中央党部部门主管及海基会董事长等要职,引发党内某些人士的公开抨击以及其它派系的警惕和不满。新潮流的发展还在于逐步朝务实、理性的方向调整,在新生代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平心而论,该派系的壮大对民进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新潮流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拥有一批理论水平较高、热心党务工作的中青年党工,对民进党的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新潮流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拥有一批长期从事社运的工作者、一批长期为公职人员辅选助选的人材、一批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助理的青年幕僚,这有利于民进党进一步开拓社会基础,扩大支持力量,尤其是更广泛地争取中下阶层民众的支持。

3、新潮流与台湾各界别、各阶层青年有着较为广泛的接触,聚集大批年轻的支持力量,包括相当数量的外省籍第三、四代,这在中央党部的正副主管以及地方党部都占有一定的份量。

4、新潮流曾经是陈水扁、谢长廷以及党内某些无派系背景的重量级人物林义雄、苏贞昌、蔡英文等不能不联合及借用的力量,而该派系凭借自身优势和实力,左右逢源,利用各种矛盾,以获取最大的派系利益。

在陈水扁执政后期,民进党内派系生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趋于激烈化,陈水扁在摆平各派系矛盾冲突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陈水扁政府的施政无能,尤其是连续爆发一连串贪渎弊案,引起党内以新潮流系为主的部分成员的强烈批判,并引发了各派系之间特别是非新潮流系与新潮流系之间的激烈斗争。2006年,为了改善外界对民进党派系林立的负面观感,同时让非新系的各个派系抒发心中不满,在时任党主席游锡堃的主导下,民进党全代会通过了解散派系的决议,规定其后党内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对外募款,召开会员大会,邀请政务官报告,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退出派系。但是,这一决议丝毫未能改变民进党根深蒂固的派系政治生态,事实证明“解散派系”不过是一句口号、仅仅少了一块招牌而已,派系活动转入地下,日常运作依然如故。在2008年“总统”大选提名过程中,民进党内逐渐形成以陈水扁和有意竞逐2008年“大选”的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等几位“天王级”重要人物为核心的新政治圈子,外界一般分别称之为“扁系”、“游系”、“谢系”和“苏系”,从而使得民进党派系运作模式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变成主要以特定重要人物为核心,而不是以往那种以特定派系名称

来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在2008年“立委”和“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过程中,民进党派系之间的激烈恶斗及其造成的伤痕,其后深刻地影响着党内派系之间的互动。

2008年5月陈水扁下台之后,其政治影响力迅速衰退,民进党终于摆脱陈水扁“一人独大”的局面。派系生态再度重新分化组合,尤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于陈水扁下台及其家庭弊案的冲击,扁系有如“树倒猢猻散”,实力大幅削弱;而原新潮流系<sup>[1]</sup>的实力则相对有所上升,并再次引发其他派系对新潮流“一派独大”的警惕和忧虑<sup>[2]</sup>。为了在未来的民进党内占据有利的位置,各派系无不竭尽全力展开竞争,在党内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派系运作有可能再度回到以往“共治”的局面。

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客观上存在着若干天王级人物,这些人在党内各有自己的山头 and 势力,都曾经担任过重要的公职和党职,有着较为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具有一定的声望。尽管他们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似乎阻碍党内的世代交替,并且一直是媒体关注和炒作的重要对象,有损民进党的形象,但是他们对于民进党内部的整合及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在涉及党的重大利益或者公职选举时,他们一般都能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力争党的利益的最大化。

## 二、民进党派系形成的原因及其特征

民进党之所以形成如此鲜明的派系政治生态及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制度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民进党成立时是一个各路反国民党势力的集合体,成员之间在成长背景、政治阅历、政治理念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歧异,其成立后的各个派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建党之前各类不同势力延续或者分化组合而来。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为了适应原本党外的山头权力结构,同时为了区别于当时国民党的威权政党特质以作为选举的诉求,民进党一开始就在组织结构上刻意强调民主、分权与反寡头。譬如在决策机制上采行合议制,党主席除了任命中央党部秘书长和一级主管外,与中常会其它成员的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倘若中常委对于党务没有共识,在党主席只能协调却无实权作最后决定的情况下,中常委之间的合纵连横即成为民进党权力核心的常态。同样地,民进党党务重大议案若是在全代会上要诉诸党代表的表决来达成决议时,派系、公职山头理所当然通过头面人物来动员党代表支持,甚至是寻求各个不同势力或是山头之间的合作。如此一来,民进党即形成派系倾轧的政治生态<sup>[3]</sup>。另一方面,民进党内派系政治的兴盛也跟党内外各种选举制度密切相关。譬如以往台湾地区的“立委”选举长期实行所谓“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一个选区往往有好几个当选席次,于是不同派系都有争取的空间,同时每一位候选人不仅要与其他政党的候选人竞争,还要与党内的同志竞争,因此在党内“拉帮结派”、累积实力就成为候选人的理性选择,而无派系奥援的候选人在历次选举中,均较无获胜机会<sup>[4]</sup>。同样的,在民进党的各种党职选举制度或公职的党内初选制度也为派系的形成提供了制度的诱因。

从民进党派系的特征来看。首先,若是以结合特点对民进党成立以来曾经存在以及仍在活动的众多派系进行分类,那么可以分为理念型派系和利益型派系两类<sup>[5]</sup>。一般认为,新潮流系和“台独联盟”属于理念型的刚性派系。两者内聚力强,组织纪律严格,富有斗争精神,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特别是新潮流系,其之所以能够在民进党内长盛不衰、叱咤风云,就跟上述特点密不可分,然而也正是因为其强大的战斗力,一直以来都成为党内其它派系忌恨和联合围剿的对象。至于其他派系则基本上属于利益型的派系。这些派系的成员尽管在理念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相容性,但成员之间更多地是为了权力资源和利益分配的需要而结合成派系。一般而言,这些派系纪律较为松散、成员对派系的忠诚度较低,从而在与其他派系斗争时往往缺乏战斗力。比如一向被视为陈水扁嫡系部队的正义连线,尽管该派系在陈水扁上台后一度成为民进党内拥有最多“立委”的“第一大派系”,但是在“立法院”以及党内的多次联合行动中,该派系内讧不断,不按派系决定投票的跑票事件一再发生,从而使其“第一大派系”的称号显得名不副实。此外,利益型派系往往以个别领导人物为核心,其发展兴衰很大程度上系于领导人物的政治命运。譬如曾经作为民进党最大派系的

美丽岛系在1990年代末期以后之所以瓦解,就跟其领导人的内讧(许信良和张俊宏)、去世(黄信介)以及离去(许信良退党)密不可分。而以往一直奉陈水扁为领袖的原正义连线成员,其实力曾经随着陈水扁的上台执政而水涨船高,但在陈水扁下台后也不可避免地大幅下滑。其次,虽然派系在民进党的党章中未被承认,但在2006年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决议以前,民进党内的派系长期以来都以公开化、制度化的方式在运作,各派系大都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对外募款、召开会员大会等等,同时党内没有明显派系背景的“政治孤鸟”可谓少之又少。因此,民进党派系的“正当性”非常高,长期以来已为党内政治精英与党员所依赖<sup>6</sup>。民进党虽然已经通过了解散派系的决议,但实际上该决议形同具文,各派系仍然以其他变通的方法进行运作。譬如前“行政院长”游锡堃、苏贞昌、谢长廷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其中谢长廷还成立“维新基金会”,并以“影子政府网站”作为对外发声管道,而原新潮流系则改名为“台湾新社会智库”重新出发。因此,解散派系决议的通过,只是使得民进党内原本制度化且公开活动的派系,化明为暗地继续运作而已。

民进党内派系结合的基础在各个时期、各个派系都有差异,但总体上脱离不了利益结合这个基本点和共同点。自党的五全大会将“台独”条文列入党纲后,党内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平息下来,派系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随着党的转型推动,进入体制,采取选举路线,中间派系崛起,各派都朝务实方向发展,利益结合成为派系结合的根本和基础,对派系的认同就很难以意识形态和理念来进行区分,而反映在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派系利益的争夺与冲突,有时甚至是个人恩怨所致。民进党各派系实力历来是以公职人员数量为标准,各个派系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全台性“民意代表”(“立委”、“国代”等)和各级行政首长,中坚分子也是掌握一定资源的各级公职人员,各级公职人员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党员支持及选民基础。因此以公职人员数量衡量各派系实力是有一定依据的,也切合实际情况的,其它国家及地区也是以此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一方面反映社会支持基础,另一方面体现该派系在政坛的地位。

### 三、派系的作用及其对民进党发展的影响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党内派系斗争一直伴随着其发展的全过程。换言之,一部民进党的发展史,就是党内派系斗争与妥协的历史。派系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主导着民进党的资源分配,左右着民进党的人事安排以及政策走向。民进党的派系与生俱来,逐渐发展成为多元化及共治的局面,运作机制也趋于完善,总体而言,派系多元化及共治的状况是民进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该党的型态、性质、体制及其演变相适应的。事实证明,这一方式对于党内生态平衡及总体发展具有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意义。

首先,在人事安排方面,除极少数具有专业规定的职位以外,只要是民进党能掌握的职位,无不受到派系政治的影响。每逢选举,不管是竞争公职候选人的提名,还是竞选党内权力机构的职务,都是派系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想要在选举中胜出,一般都离不开派系的支持。对于各派系而言,一方面要根据自己拥有的票数来安排参选人员,然后把本派系所能掌握和动员到的票数进行合理配票,使选票所能发挥的作用最大化,务求本派系成员能有最多的人当选。另一方面,为了本派系的利益,派系之间还经常合纵连横,相互交换选票,以求得对自己最好的选举结果<sup>[7]</sup>。通过把本派系或者合作派系的人员送进党的决策机构,各派系就可以达到影响党的路线、政策的目的。而民进党的决策机构——中常会、中执会长期以来也确实为各派系所把持,沦为派系分赃的工具,外界也经常根据各派系成员在民进党权力核心——中常会、中执会的席次分布情况来判断各派系实力的消长。此外,除了民进党内的各种职位以外,在民进党所能掌握的其他职位,譬如“立法院”党团、行政机关以及公营企事业单位中的职位等等,也都明显受到派系政治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在陈水扁上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团的所有干部职位全部根据派系来分配,可谓最为彻底地实行了“派系共治”的原则。

其次,民进党的政策走向也深受派系政治的影响。每一次民进党的路线选择以及政策制定,都伴随着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妥协。譬如,1998年2月,民进党为求整合党内的大陆政策共识,召开了“中国政策研讨会”,会上由主张“大胆西进”的美丽岛系为一方,与主张“强本渐进”的新潮流、正义连线和福利国连线为

另一方展开辩论。经过3天的辩论,双方达成妥协,提出“强本西进”作为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的基调。这次辩论形象地体现了派系政治对于民进党政策制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各派系之间实力的消长变化,也往往决定了民进党整体的政策走向。譬如,1990年代初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就跟民进党内派系生态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美丽岛系影响力下降、新潮流和中间派系崛起、“台独联盟”自海外返台,导致民进党中常会的权力组成逐渐发生质变,进而造成“台独路线”的激进化<sup>[8]</sup>。因此,评估和判断民进党的政策走向,各派系实力的消长变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既然派系政治在民进党的各项运作中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其对民进党的发展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以下将分别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正如民进党籍学者郭正亮所指出的,民进党内“派系政治的泛滥,使民进党不管在建立互信或推展改革上,都饱受派系斗争的党内质疑,不少民进党人总习惯用派系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而无法就事论事面对问题。更糟糕的是,这种泛滥的派系斗争,并不只限于某个派系特有,而是民进党内极为普遍的思考模式。不断杯弓蛇影、互相猜忌的结果,不但造成党内阴谋论的猖獗盛行,同时也导致制度规范的改革困顿。民进党内动辄诉诸派系斗争的阴谋论,已经到了反智与反动的地步。”<sup>[9]</sup>同时,派系的恶斗,也严重影响了民进党内的团结,对于民进党的形象也带来极大的损害,抵消了其应有的政治竞争能力。譬如,在2007年的民进党内“立委”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初选过程中,各派系展开激烈厮杀,造成严重内讧。为了避免在2009年县市长候选人初选中再次出现派系恶斗的局面,民进党不得不暂停实施多年的党内初选办法,而改为授权中执会全面协调及征召来决定提名人选<sup>[10]</sup>。面对派系恶斗给民进党形象和整体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年来民进党内要求解散派系的声音不断,并最终在2006年通过了解散派系的决议。不过,在民进党内的派系政治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一决议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

然而,在看到派系恶斗给民进党所带来的伤害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派系政治对于民进党的发展的积极影响。这些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进党内派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正是派系的存在,使得民进党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看法,派系的共存与合作,对于民进党扩大社会基础,保持路线的相对中和以及发展步伐的相对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sup>[11]</sup>。

第二,派系在民进党内扮演着挖掘、培养、训练人才的正面功能,同时还起着协调、沟通以及意见整合的重要作用。正如新潮流系前“立委”段宜康在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决议之后所指出的,“没有了派系,民进党内将欠缺沟通协调的机制,无法约束个别政治人物,不容许制度性的派系存在,未来看到的会是一个无法被检验的山头和小圈圈,这并不是好事”<sup>[12]</sup>。

第三,除了表面的派系竞争、权力争夺、意见纷争之外,民进党内常态化的派系竞争,使得各派系得以共同分享政党领导权,进而避免采取分裂政党的方式以争取生存空间。尤其当派系共治的权力结构形成之后,表面上看似权力分散,甚至毫无纪律可言,但也因为派系共治的结构,没有任何派系可以完全倾轧、压迫其它派系,更有可能在纷争之余,进而促成更能够满足多数派系的决议。同时,在派系共治的权力逻辑下,特定派系成为永远输家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因为随着议题的不同,将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这样的情况使得个别派系在不同的利益结构下,形成不同的结盟关系,进而使各派系能够有更大的运作空间,进行利益的交换,而非你死我活的决斗<sup>[13]</sup>。在台湾政坛,泛蓝阵营各主要政党(国、亲、新),平时未有如民进党一般的公开派系竞争以及杂音,但往往在面临重大选举失利、党内权力接班,屡屡引发严重的党内政治风暴。然而,派系林立的民进党,虽然杂音不断,但却未有如国民党一般的严重的政党分裂。

第四,以往派系共治的权力生态使得民进党可以避免内部走向封闭和权力集中,甚至出现“一言堂”的现象,而各派系之间对于路线和政策的讨论和争辩,也往往是民进党活力来源之一。相反的,在陈水扁执政期间,“派系共治”的权力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其结果就是民进党被陈水扁一人所绑架,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对于这一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不得不承认,她指出:“民进党本来是民主、开放的体制,但在执政后为了凝聚力量而将权力集中在一个或一群人的手上。这种民进党内部领导的威权化是很危险的,民进党必须重新建构一个机制,让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权力。同时内部的争吵与辩论也是好的,可以降低决策的风险”<sup>[14]</sup>。

---

注释:

[1]2008年9月,原新潮流系进行了改组,并改名为“台湾新社会智库”,参见《民进党新潮流吹熄灯号告别叱咤风云24年》,中国新闻评论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4/2/4/10074247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42479>。

[2]《高志鹏:新潮流一派独大,蔡主席妳错了!》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0/0/6/10070062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00622>。

[3]武炳昌:《民进党派系政治与提名制度》,台湾淡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第31页。

[4][6]郑明德:《一脉总相承:派系政治在民进党》,台湾时英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423页、第427页。

[5][7]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41页。

[8][9]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第113页、第168页。

[10]《民进党20日讨论2009县市长协调征召方式》,星岛环球网:[http://metro.singtaonet.com/hot\\_news/gd\\_20080710/200807/t20080710\\_810392.html](http://metro.singtaonet.com/hot_news/gd_20080710/200807/t20080710_810392.html)。

[11]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40、41页。

[12]《民进党决议“解散派系”党内苦闷拿新系开刀》,东方网:<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4/node149941/u1a2200495.html>。

[13]徐永明、陈鸿章:《党内派系竞争与政党选举命运——以民进党为例》,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1期,2007年3月,第129-174页。

[14]蔡英文:《坚持“勤政、清廉、本土”的价值民进党有更深责任》,民进党新闻稿,民主进步党网站:<http://www.dpp.org.tw/>。

(责任编辑 毛仲伟)

---

(上接第25页)

---

注释:

[1]朱磊:《ECFA后两岸金融合作展望之二》,中国台湾网,2010-10-21 11:06。

[2][6]唐永红:《尽快推动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华夏经纬网2011年5月3日,<http://www.huaxia.com/tslj/jjsp/2011/05/2397119.html>。

[3]吴孟道:《人民币缺货如何解》,台湾《中央日报》网络版2010年5月27日。

[4]孙效孔:《两岸货币清算的急迫性》,台湾《工商时报》2010年1月29日。

[5]林建甫:《尽速推动两岸贸易以本币结算》,台湾《旺报》2010年12月18日。

[7]郑航滨:《海峡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比较和模式研究》,《福建金融》2005年第5期。

[8]严佳佳、梁俊:《海峡两岸货币合作与汇率协调机制研究》,《福建金融》2011年第3期。

[9]杜琴庆:《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正式起步 或将向企业客户放开》,《东方早报》2010年7月14日。

[10]香港集思会人民币课题研究组:《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研究》,《港澳台金融》2011年第2期。

[11]郑航滨:《海峡两岸货币清算与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研究》,《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2][13][14]郑航滨:《海峡两岸货币流通与清算合作机制研究》,《金融与经济》2009年6月。

[15]吴孟道:《未来两岸金融合作事项推动之评析》,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2011年5月4日,<http://www.npf.org.tw/post/3/9122>。

[16]王胜坤:《人民币为货币清算机制隐忧》,台湾《苹果日报》2009年12月28日,<http://www.npf.org.tw/post/1/6879>。

[17]刘明德:《外汇存底纳入人民币的可行性分析》,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2009年8月27日,<http://www.npf.org.tw/post/2/6368>。

(责任编辑 朱磊)